

烽火涅槃：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山大因应

崔华杰

摘要：1928年“济南惨案”爆发，此时迎来国立化发展时机的省立山东大学因日本强据济南，其国立化进程一再耽延，并最终转往青岛办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山东大学以服务国家为发展取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战时教育，展现特殊年代的大学职能。“七七事变”后，山东大学又被迫内迁，辗转多地办学，为国家未来的独立与富强积蓄力量。立足日本侵华战争的考察维度，以山东大学的战时因应作为个案分析，可以借此展现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战争烽火中的教育奋争。

关键词：山东大学；日本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大学内迁

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5.05.018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沉痛篇章，更是中华民族不容忘却的历史时刻。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对这段历史的书写中，东北大学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被迫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①，南开大学则在1937年“七七事变”事变后成为“第一所遭日寇毁掠并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②。然而，如果我们将研究视角从民族抗战转向日本侵华，特别是置于日本侵华活动的全过程，则会发现山东大学实际上早在1928年“济南惨案”时就不幸遭受战争劫难，并在此后饱受战火影响。为此，本文拟从日本侵华战争的维度，考察山东大学的战时因应，借此展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历史缩影和战争烽火中的教育奋争^③。

一、“济南惨案”与山大国立化进程中的由济迁青

1928年5月“济南惨案”爆发，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④。此时省立山东大学刚成立两年，在探索现代大学体制方面已卓有成效，并迎来了国立化的发展契机，然而因日本强据济南，学校最终转往青岛办学。山东大学也不幸成为全国最早遭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的高校。

（一）“济南惨案”前省立山大对现代大学体制的探索

山东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901年的山东大学堂，经山东高等学堂和山东高等学校等发展阶段，在民初“壬子癸丑学制”教育改革中因山东地区只得设立专科学校而遵章停办，部分师生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公立法政、工业、农业、商业四所专门学校，校舍则由法政学校承接使用。据1925年的高等教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一般项目“近代来华西人对山东史地的知识建构及其学术流变”(21CLSJ06)；山东大学2025年度“一院一品”项目。

作者简介：崔华杰，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校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济南250100；huajiecui@163.com)。

① 张在军：《东北大学往事：1931—1949》，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329页。

② 薛进文：《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人民日报》2015年7月23日，第12版。

③ 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山东大学历史发展多有涉及，但多考察全民族抗战后的学校发展，关于济南惨案对学校国立化进程的研究少有成果关注，对于学校的战时教育和西迁精神的研究也缺少系统归纳。相关代表性研究参见《山东大学百年史》编委会编：《山东大学百年史：1901~2001》，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9—109页；胡孝忠、秦丽媛：《困顿与涅槃：抗战时期国立山东大学的内迁与复校》，《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崔华杰：《全面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的特色生成之路》，《河北开放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④ 李家振、郭墨兰：《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育调查,当时全国包括国立和省立在内的公立大学共计34所^①,除了集中于北京、南京、上海等中心地区,不少省份也多办有公立大学,如湖北有国立武昌医科大学、河南有省立中州大学。至于“文化发源之地,圣贤桑梓之邦”的山东^②，“中学十余处、学生数十万,而无自办大学,实数欠缺之至”^③。

1925年春,奉系军阀张宗昌入鲁,筹划利用山东公立法政、工业、农业、商业、矿业和医学“六专”的办学资源,在济南筹组综合性公立大学。经年余筹备,1926年7月,山东省政府下令取消六所专门学校建制,共同组建山东大学(习称“省立山东大学”),省教育厅厅长、清末状元王寿彭受命兼任校长^④。

在“济南惨案”爆发之前,省立山东大学遵照北京政府相关政令,结合山东省情量加变通,探索现代大学体制的地方方案。学校在调整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治校水平,设立由校长担任主席的评议会,定期研究发展谋略、人事机构、教学科研、经费预算等事宜,又在各院系分设教务会议和教授会,具体负责院系事务开展。学校推行学院制,分设5院13系(当时称“科”“分科”)。据其办学章程《山东大学规程》规定,文、农、工三科修业年限四年,法、医修业五年^⑤。开校当年,学校招收新生95人,连同“六专”合并的一年级学生共有1088名在校学生^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立大学院并在此基础上改组为教育部,统管全国学术及教育事务,其职能之一就是调整全国大学机构,增设公立大学,推进国立大学建设进程。山东在“济南惨案”爆发前仅有省立山东大学、齐鲁大学(教会大学)和已经停办的私立青岛大学(1924年创办后仅招收一届学生),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缺少国立大学已然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呼声:“平津以南、汴洛以东,黄海、渤海之西岸之广大区域内应有一国立大学。”^⑦省立山东大学此时寻求升格为国立大学,可以说迎来了政策窗口和发展契机。

(二) 济南沦陷与国立化进程的耽延

正当省立山东大学寻求升格国立大学之际,中外关系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而悄然生变。1928年4月,蒋介石军队自南京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一路进逼山东省。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在青岛登陆并沿胶济线增兵济南。5月3日,日军在济南寻衅滋事,肆意杀戮中国军民,并戕杀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相关职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在蒋介石密令北伐军撤出济南之后,日军借此炮轰济南城并派兵驻扎城内,还将省立山东大学校本部周遭的趵突泉一带划为禁区,禁止中国军队进入。

日军对济南城的占领,给社会各界带来极度混乱的状态,省立山东大学师生迫于人身安全而四处离散,学校由此陷入停顿。尽管面临中外舆论之压力,日军却拒绝从济南城撤兵,省立山东大学于1928年6月7日被迫宣告停办。鉴于奉系军阀张宗昌从济南败退,由南京国民政府组建的山东省政府暂署泰安,并于8月着手推进省立山东大学的国立化之路,其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报请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计划“在省立山东大学基础上,在济南重新筹建国立山东大学”^⑧。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令将省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设立筹备委员会,聘何思源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⑨。8月7日,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泰山红门宫召开第一次会议,商讨院系设置、校舍扩建、经费筹集、学生收录

① 中国教育年鉴编审委员会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6—17页。

② 新民:《鲁学界之风潮与当局计划》,《益世报》1922年12月10日,第6版。

③ 怀民:《鲁教厅接收六专后之情形》,《益世报》1926年7月6日,第6版。

④ 《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已就职》,《申报》1926年7月9日,第16版。

⑤ 参见校史编写组:《省立山东大学的创建》,《山东大学校史资料》1981年第1期。

⑥ 参见山东大学校史编写组:《山东大学校史(1901—1966)》,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⑦ 《校史述略》(1946年12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871-001。

⑧ 石耿立、朱瑞莲:《书生报国:何思源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6页。

⑨ 《校史概要》,载《山大年刊》1936年,第4—5页。

等事宜^①。按照工作规划,国立山东大学本应于1929年3月在济南开学,然而还是因为日军继续盘踞济南,未能如期实现。

自1928年春夏就开始谋划国立化的省立山东大学,其实位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第一批国立化大学进程之列,然而却被日本对济南的侵略而打乱了国立化发展步伐,并延迟到两年之后才顺利落成。事实也证明,1928年的确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国立化进程明显加速的一年,当年7月国立浙江大学正式成立,8月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武昌第二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另据时任教育部大学教育科科长谢树英晚年回忆,当时教育部为了改善大学“偏于沿海大城市”这一局面,便批准筹办国立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北农学院^②。总之,省立山东大学的国立化进程尽管起步较早,此时却面临无法实施的客观环境。

(三)由济入青与学校发展转向

日本久据济南,在济南筹办国立山东大学似乎前景渺茫,转换地理位置办学不失为明智之举。1929年6月,蔡元培先生在青岛休养时住进了已经停办的私立青岛大学,对校园周边环境和青岛地理禀赋印象颇佳。他认为济南乃四省通衢,为兵家必争之地,而青岛地处海滨,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遭战争祸端,便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改迁青岛,还认为“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③。教育部接受蔡元培先生这一提议,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改名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指令其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1930年9月21日,学校在青岛顺利举行开学典礼,杨振声宣誓就职校长,省立山东大学的国立化之路至此方告完成。

日本对济南的侵略,不仅导致山东省唯一一所国立大学的地理转移,客观上还影响了该校学科学术的发展转向。在省立山东大学时期,其文学院设中国哲学、国文学两系,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商学三系,工学院设机械、机织、应用化学、采矿四系,农学院设农学、林学、蚕学三系,医学院设医学系,学科布局齐整,展露出综合性大学的学科气象。然而,学校于1930年在青岛开校时,仅有文、理两院顺利开办,下设中文、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六系,此后院系时有调整,直到1946年复校后才达到5院14系的办学规模。尽管山东大学在国立时期结合青岛自然地理优势营建了海洋、生物等新兴特色学科,塑造了校史上的两次黄金发展时期,然而没有接续发展省立山东大学的学科体系,尤其是未能开设经济、商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殊为学科发展憾事。

因日本侵略而导致的学校迁址,也使今时的山东大学丧失了可凭观览的建筑遗产。省立山东大学由六所学校合并发展,其校址分布在济南杆石桥、趵突泉、皇华馆、山水沟、全福庄、白鹤庄等六地,尤其是其法科所在的杆石桥校区乃系山东大学堂于1904年更名为山东高等学堂后新建。既然省立山东大学迁青,其济南校舍自然也变成闲置资产。山东省教育厅曾多次商请杆石桥校区的转用:“现在山东大学改为国立青岛大学,济南法科停办,该处房舍,业经空闲,拟请归回。将该处地址,让归敝厅,改充省立高级中学及省立第一中学校舍。”^④最终,这片承载了山东大学早期历史与人文精神的现代化校园被中学接管使用,历经社会变迁后成为今山东省实验中学的中心校区。

① 筹委会此后又适时召开5次会议,其中还邀请蔡元培、傅斯年、蒋梦麟、杨振声等名流参会。参见《请杨振声、傅斯年来济的信函》(1929年6月25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271-010;《请蔡院长、蒋部长来济参加筹委会》(1929年7月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271-014。

② 谢树英遗稿:《八十七春秋忆往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36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98页。

③ 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④ 《嘱收前山大法科房舍让归省立高中及一中函》(1929年7月1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287-006。

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山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勃兴

1931年秋,日本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山东大学后,师生群情激愤,悲切之情难以言表。此后,随着事态的日趋严峻,山东大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追求进步,奏响全民族抗战前奏

1931年9月30日,山东大学秘密成立了校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由中文系学生王弢(王林)担任,党员有黄敬(俞启威)等^①。10月1日,学校成立反日救国会,鲜明打出了抗战救国的口号。国立青岛大学改建为国立山东大学之后,学校又重建地下党支部,李香亭(李克明)、王广义(王路宾)、李实谔组成支部委员会^②。根据中共青岛市委指示,山东大学党支部组织“读书会”“时事讨论会”等团体,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一些进步学生走出校园,发起请愿运动。1931年11月30日,学校的进步团体召开反日救国大会,会上有179名同学志愿赴南京参加请愿运动。杨希文、魏少钊同学带领文、理、教育三个学院组织的中队,赶赴南京请求政府抗日。请愿团与集会到南京的多地高校学生连枝同气,到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国民党中央党部呈递请愿书,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战的呼求^③。

山东大学还组建了山东省第一个革命戏剧团体“海鸥剧社”,开展文艺活动,宣传抗日主张。1932年4月,王弢和黄敬等组织学校进步师生成立海鸥剧社,并与上海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取得联系,获得准许后以青岛分盟小组的身份开展活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海鸥剧社编演进步话剧,走进码头、工厂和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唤醒民众抗日觉悟,还曾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报”《文艺新闻》专文报道^④。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受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山东大学各级学生于当月18日成立学生抗日救国会^⑤,并通电全国,呼吁慰问北平学生,“愿以最大决心,誓为后盾”^⑥。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山东大学进步师生参与奏响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曲。

(二)服务国家,开展战时教育

在风雨飘摇的战争年代,山东大学师生坚持战时教学科研,突出大学服务国家的社会功能,展现出特殊年代的大学职能。

学校于1932年改称国立山东大学后,增设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两系,提升工程学科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能力。另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风头强劲,特别是随着上海等重要城市的沦陷,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生命是在农村,在田地”^⑦。山东大学于1934年成立农学院,并附设研究院,作农业之专门研究,实为“大学研究院性质”,“其价值在普通大学、农学院以上,且为全国之创举”^⑧。这一举措深得蔡元培先生赞许:“惟山东大学近年在济南所设之农学院,完全与余所提议者相同,余以为其成绩必胜于其他大学不设研究所之农学院也。”^⑨

① 王弢之子王端阳认为,早在1931年4月,中共青岛大学党支部即已成立,此时其父已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便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职。王端阳:《父亲王林在国立青岛大学》,载桂国强、蔡晓滨主编:《良友》(第12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② 王琪珑、赵爱国主编:《山东大学纪事:1901—2020》,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9页。

③ 山东大学档案馆编:《山东大学大事记:1901—1990》,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④ 《预报了暴风雨的海鸥:月亮上升、工厂夜景》,《文艺新闻》1932年6月13日,第2版。

⑤ 《山东大学学生救国会成立》,《申报》1935年12月19日,第3版。

⑥ 《山大学生组织学生救国会》,《青岛民报》1935年12月19日,第6版。

⑦ 《农业国家的长期抗战》,《现代农民》1938年第2期。

⑧ 《山大农学院本年暑期成立》,《时事新报》1934年5月8日,第3版。

⑨ 蔡元培:《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东方杂志》1935年第1期。

山东大学特别重视学术科研的实践操作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据王淦昌回忆,“在国难当头,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学设备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们亲自带领学生克服困难,自制各种实验仪器”^①。化学系对山东医药进行综合研究,生物系对海洋生物进行摸底调查,农学院开展莱阳梨病虫害防治以及山东棉花品种改良的专题研究,不仅是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贯彻,还体现出服务国家的发展方向。山东大学的这一学术研究特色,还得到官方嘉许。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5年6月下发训令,指出“查该校(山东大学)近年设施,尚能循序稳进,殊为可嘉……化学方面注重中国药材之分析,生物方面注重海滨生物之研究,至为切当”^②。

随着战事益紧,不少教授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抗战所急需的领域。化学系傅鹰教授指导学生勾福长进行活性炭制备和吸附作用的研究,还被使用到防毒面具的研发中。1936年秋,南京兵工总署召开防毒会议,化学系汤腾汉教授与勾福长同学受邀致辞并发表论文,受到相关研究人员的赞许和兵工总署的好评^③。王普教授在山东大学青岛开校的当年即来物理系任教,工作五年后赴海外留学,后到美国参加原子弹的初期研究工作,被誉为“中国最早从事原子核分裂研究的学者”,其研究“对以后的核裂变反应堆的物理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④。抗战胜利后,当时中国社会流行一本小册子,叙述制造原子弹的过程,其中就提到王普教授发现了制造原子弹的重要材料“中粒子”^⑤。

(三)经世致用,学术报国

山东大学科研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秉持家国情怀的山大基因,学术抗战,科学救国,在知识的战场冲锋陷阵,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知识长城。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王淦昌于1934年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放弃海外安定且优渥的环境,毕业后即来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1934年,从比利时比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童第周,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即将蚕食华北的危险,于当年9月来生物系执教,自此与山东大学结缘22年。印尼华侨汤腾汉教授于1930年来山东大学工作,历任化学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生物系曾呈奎在1940年赴美深造,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业,在美期间时刻心系祖国,盼望尽快回国工作。任之恭于1933年放弃在哈佛大学的教职,回国后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李达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即来山东大学数学系工作,曾任代理系主任。陈传璋于1935年获得法国格林诺堡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山东大学数学系教授。林绍文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于1935年任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抱持担当精神,山东大学科学工作者倾毕生所学解国家之难。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化学制药和化学试剂的生产几乎是一片空白,就连普通的药品和化学分析试剂制品都需从国外进口。为此,化学系主任汤腾汉会同部分师生筹措资金,成立“永生化学制药公司”,系我国化学工业唯一的国人控股资本,使用的完全是国产原料,销售的也全部是国货^⑥。土木工程系主任张倬甫自1934年起兼任北宁铁路局总工程师等职,负责管理东北与华北沟通的铁路大动脉“北宁铁路”^⑦。针对日军利用北宁铁路运送军事物资这一行径,张倬甫多次制造铁路技术故障予以抵抗,1937年夏不幸遭到日

① 王淦昌:《往事回顾:代序》,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山东大学九十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② 《教育部改进专科学校训令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35年,第21页。

③ 勾福长:《忆山大化学系的科研工作》,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山东大学九十年》,第290页。

④ 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⑤ 王先进:《古稀之年忆母校》,载张乐岭等编:《峥嵘岁月》,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

⑥ 曹金鸿:《化学系实习报告:天津永生化学制药公司实习报告》,《国立山东大学周刊》1937年1月18日,第4版;勾福长、赵元祥:《汤腾汉教授与山东大学化学系》,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文史集粹·科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⑦ 《北宁副局长张倬甫就职》,《中央日报》1937年6月11日,第3版。

本宪兵队逮捕并被秘密杀害。抗战胜利后,天津社会各界为抗战期间牺牲的天津地区98名烈士举行公祭和烈士入祠仪式,作为著名的工程界、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的张倬甫名列第六^①。2015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张倬甫亦名列其中。

以文字为盾,山东大学人文学者在文化战线上筑起精神长城。学校将《新文学课程》《小说作法》增设为大学课程,并立足现实主义立场把《楚辞》《诗经》等古典文学“从封建主义阐释学中解放出来还给人民”,“这是在当时全国各高等学校课程中,最先升起的一颗红星”,率先“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②。曾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被朱自清评价“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③。闻一多在任上破格录取的臧克家,读书期间即出版了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等名作,在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爱国洪流。老舍先生于1937年7月结束了在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三年教职生涯,于当年11月只身挤上去往武汉的火车,自此投身文艺抗战事业。齐鲁大学外籍教授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林仰山(Frederick Sequier Drake)深耕中国考古事业,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脉和坚韧的民族性格,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④。

(四)投笔从戎,走向战争前线

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还有不少山大人投笔从戎,走向战争前线,乃至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在可歌可泣的抗战年代谱写了山大诗篇。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山东大学学生组织南下请愿团去往南京呼吁当局对日抵抗,就在出发前夕,东北籍学生赵金堂等13名山大学子从军北上,保卫家乡,走上了抗日救亡的前线^⑤。

1932年,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戴安澜以营级军衔,奉派到学校担任军事教官。当时,凡大学、高级中学及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及其他高中以上学校,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旨在“锻炼学生身心”,提升“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⑥。按照规定,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的军事教育师资,戴安澜需在校工作2年,每星期实施3小时的军事训练授课^⑦。据1931级学生杨希文回忆,平时同学们对军训都不屑理睬,为了抗日“却一反‘常态’”,“认真听课、上操,准备打靶,学习军事技术,还酝酿研究游击战术”^⑧。

“七七事变”前后,日本相继蚕食我国东北、华北领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山东大学师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空前强烈。1936年秋冬,日军侵犯绥远,山东大学抗日救国会随即召开大会,成立“绥远抗敌后援会”,向全校师生工友发起捐款运动^⑨,还委派师生前往慰劳^⑩。1937年春,一批进步学生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大学队部,动员同学们参加义勇军,走上抗日战场^⑪。1937年7月9日,李欣、王冠仲、吴靖等作为山大代表赴北平参加民先队全国代表大会^⑫。

山东大学还有不少学子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脱掉长衫,投身游击战争。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山东大学支部改为中共青岛特别支部,领导毕家村和十梅村两个支部,由机械系学生李欣担任特别

① 《津市忠烈入祠受祭》,《民国日报》1946年7月8日,第1版。

② 李宗刚、谢慧聪选编:《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2、163、165页。

③ 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导言第7页。

④ 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35页。

⑤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大事记》,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⑥ 《教部修订军事教育方案与条例》,《大公报》1929年3月1日,第5版。

⑦ 《冉昭德学术年谱》,载杨倩如编著:《冉昭德文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王先进在其文中记作“戴安国”,载张乐岭等编:《峥嵘岁月》,第206页;山东大学官方档案记作“戴自修”,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379-021。

⑧ 杨希文:《一九三一年青岛大学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始末》,《山东教育史志资料》1983年第3期,第33页。

⑨ 《申报》1936年11月21日,第8版。

⑩ 《青岛大学代表昨来绥远傅劳军》,《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12月25日,第3版。

⑪ 李欣:《把青春献给祖国》,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长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长汀文史资料》(第14辑),1988年,第5页。

⑫ 山东大学校史编写组:《山东大学校史(1901—1966)》,第105页。

支部书记,直接受中共东北军工委领导,准备在日军侵占青岛后开展游击战争^①。中文系学生吴靖等“民先”队员还去往山东高密,加入抗日武装“蔡晋康游击队”^②。土木工程系学生韩宁夫受学校党组织委派,前往东北从事兵运工作^③。在1938年山大内迁之前,不少青年学生“都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或者直接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游击战,拿起枪杆子来跟内外民族敌人面对面地作战了”^④。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1924级校友罗荣桓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代师长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等职^⑤。物理系1931级校友俞启威则在华北多个根据地的岗位上接受历练。

在烽火连天的民族抗战时期,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也涌现出一批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优秀毕业生。1939年11月,在延安成立的中央医院下设四大科室,其小儿科主任侯健存、外科主任魏一斋、妇产科主任金茂岳均毕业于今天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⑥。他们放弃舒适的工作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怀揣着无比忠贞的理想信念和满腔的革命热情,在一孔孔简陋的窑洞内救死扶伤,用仁心妙手服务边区党政军民,为如火如荼的革命发展延续命脉、呵护希望。

山东大学师生投笔从戎者众多,尤以张自忠为杰出代表。1912年,张自忠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一年后转入省立山东大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⑦。1940年5月,张自忠在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任上,牺牲于枣宜会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分别题写“尽忠报国”“为国捐躯”“取义成仁”的挽词,以表哀悼。周恩来同志后来撰写《追念张蔭忱上将》一文这样概述:“他的殉国,影响之大,绝非他人可比……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⑧可以说,以张自忠为代表的山东大学师生,在烽火连天的民族抗战洪流中走在时代前列,把个人抱负与全民族的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展现了山大人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和使命在心的担当精神。

三、“七七事变”后山大辗转内迁与精神传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山东大学亦被迫一路辗转内迁,乃至“暂行停办”,然而其精神不灭、火种仍存,终在抗战胜利之后成功复校并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发展黄金时期。

(一)辗转四省,办学三地

“七七事变”爆发后,山东大学遵照教育部指令,“力持镇静,维持课务”^⑨。不料三个月后,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直取山东德州,战火即将蔓延到山东全境。实际上,在德州沦陷之前,学校拟遵照山东省政府意见,迁往鲁南地区的单县暂避战火^⑩。然而战火日炽,单县紧邻“济宁、兖州诸军事要地,恐非长久安全之地”,才罢迁单县之议^⑪。仓皇无措之间,学校于10月初又接到教育部命令,“以暂迁西

①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胶东地方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② 宿迁市新四军研究会、中共宿迁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89页。

③ 李欣:《我敬爱的十位师友》,载张乐岭等编:《峥嵘岁月》,第258页。

④ 赵瑞蕻:《碧海红樱忆旧游》,载张乐岭等编:《峥嵘岁月》,第33页。

⑤ 罗荣桓在读期间的成绩单,见《工科十九年班学期总成绩分数》(192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214-001。

⑥ 山东大学编:《走进山大》,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40—142页。

⑦ 《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编辑委员会编:《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⑧ 张上将自忠纪念委员会编:《张上将自忠纪念集》,上海:艺文书局印刷厂,1948年,第17页。

⑨ 《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1937年8月1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676-007。

⑩ 《召开谈话会》(1937年9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676-002。

⑪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五-5343,第19—20页(注:该页码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电子化编码,下同)。

安上课为宜”^①，遂将部分仪器设备打包装箱，委托胶济铁路管理局、津浦铁路济南车站和陇海铁路徐州车站等予以协助运输^②。旋因战事吃紧，学校师生迁往西安始终未能成行。

平津接替沦陷之后，青岛风声鹤唳，几成空城。1937年11月初，山东大学得到教育部批准，计划迁往安徽安庆，借省立安徽大学部分校舍办学，与安大“在教学、科研、设备等事切实合作”^③。11月7日，山大函告安大，告知已将部分图书仪器运往其菱湖公园校地，并派员前往对接筹备^④。学校组织在校师生分批离青去往安庆，并在中外报章发布公告，“定十二月五日在安徽大学校址开课”^⑤。1937年上旬，山东大学在校师生告别青岛，沿胶济、津浦铁路南下疏散，踏上了流徙办学之路。

安徽大学菱湖公园校地，为山东大学内迁途中第一个临时校址。然而随着战局恶化，日寇迫近，安徽大学也不得不向西南疏迁。实际上，山大图书馆工作人员曲继皋先行到达菱湖公园时，“安徽大学已在整装准备南迁”^⑥，其后化学系助教郭质良在南京江边集合同学300余人，直驱安徽大学校园，“不意该校已先一日迁离”^⑦。在安庆逗留还不到一周，代理校长林济青致电教育部，禀告已派员前往四川万县勘筹校地，盼请教育部能与四川省政府电商协助^⑧。

安庆非久留之地，林济青无奈发表临别启事，感谢安徽各界给予的帮助^⑨。山东大学师生乘船上溯湖北汉口，计划转经宜昌入川。此时南京保卫战爆发，汉口已成国家中枢。学校抵汉后，师生借住武昌当地一所小学运行校务，并在汉口设有办事处。据土木工程系1933级学生周俊逸回忆，当时驻守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周恩来同志，还曾“亲自前来慰问”山大师生^⑩。受革命精神感召，王华美同学到山西参加“牺盟会”，周仲篪同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⑪。

在武汉办学月余，山东大学经与四川省政府驻武汉办事处协商，派员前往万县勘划校址^⑫。艰难购得船票之后，师生溯长江而上，经行沙市、宜昌，西进四川万县。1938年2月12日，学校整体迁到四川万县，校方向教育部报请开学事宜：“本校教职员、学生已到万，借定城北石家庄为校址，筹备就绪，定于本月十四日复课。”^⑬1937年11月初，自青岛疏散迁移，山大师生经近四个月的多地周旋，终在大后方谋得了一片“立锥之地”。

（二）开枝散叶，浴火待生

1938年2月18日，山东大学给万县县立中学、文昌宫女子小学发去笺函，感谢“惠备校舍”之情谊^⑭。然而就在当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发训令，鉴于时局动荡、经费支绌，“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2月26日，王志超、汪公旭代表学校“布告停课办理结束”^⑮。3月1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国

①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五-5343，第21页。

② 《迁校西安先运前存济南仪器有关公函》（1937年10月11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677-006。

③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五-5343，第73页。

④ 《本大学请准迁皖派员去安徽大学接洽》（1937年11月7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676-014。

⑤ 《山东大学决迁皖》，《民报》1937年11月9日，第1版；“Shantung University Removing To Anhwei”，*The China Press*，Nov. 19, 1937, p. 9.

⑥ 曲继皋：《抗战前后的山大图书馆》，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第371页。

⑦ 郭质良：《魂系祖国——简记我之化学生涯》，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第302页。

⑧ 《迁校安庆定期开学暂定办公地址知照安徽省警察局》（1937年11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676-019。

⑨ 《国立山东大学迁皖留别各界启事》（时间不详），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676-024。

⑩ 周俊逸：《拳拳思念情——悼念恩师张倬甫教授》，载张乐岭等编：《峥嵘岁月》，第234页。

⑪ 徐中玉：《两次在山大的回忆》，见张乐岭等编：《峥嵘岁月》，第250页。该文将周仲篪记作“周中篪”。

⑫ 《本大学以时局紧张筹拟西迁四川省派员前往万县勘划校址等有关文件》（时间不详），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677-010。

⑬ 《呈报教育部本校西迁万县之开课情形》（1938年2月18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764-020。

⑭ 《致万县县立中学、文昌宫小学感谢函》（1938年2月18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764-021。

⑮ 《关于停办国立山东大学的训令》（1938年2月26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764-001。

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负责盘查和保管校产,编造校产清册等事。4月,教育部颁发《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办法》,规定教育部成立保管处保管山大校产^①。6月,教育部下令解除林济青的代理校长职务。因日本侵华战争,国立山东大学至此暂告终结。

山东大学自青岛一路内迁,图书、仪器、案卷等设备与资料也随之转移。第一批257箱运至西安,旋又经宜昌转运至万县;第二批837箱运至江苏浦口,然因南京于1937年12月失陷,该批物资全部丢失;第三批16箱运至汉口,又转运至万县^②。未能迁运的学校资产,在日军攻占青岛后或被捣毁或被占用。随校迁到西南大后方的校产,在学校暂行停办后也被国家调拨使用。1938年春,教育部下发训令,将山东大学学科设备拨发给中央图书馆、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保管使用^③。根据该训令,山东大学图书部分暂交中央图书馆,仪器部分(包括标本药品)暂交中央大学,机械部分暂交中央工业职业学校^④。据统计,山东大学中外图书以及若干善本“合约万数千册”,交由中央图书馆接管^⑤。又据中央工业职业学校签发的收据清单,该校共接收山东大学各类仪器设备物资“共计30箱外附化学药品5种”^⑥。1938年夏,教育部决定创建一所国立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又指令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将其所保管的山大设备物资,“作为设立国立师范学院”之用^⑦。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还专门针对该批“借用未还”的“仪器书籍等件”造册登记^⑧。

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山东大学实际上迎来了校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其主要表现就是名家荟萃、人才济济。随着学校暂行停办,一些教职工被政府分配到国立编译馆、中央图书馆工作之外,大部分知名教授则被其他内迁高校聘走。如数学系的代系主任李达先后任重庆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陈传璋教授去往重庆大学等校并于1945年创办复旦大学数理系,李珩教授去往华西大学执教,李锐夫教授去往重庆大学执教;生物系的系主任林绍文去往国立贵阳医学院并在1947年担任中央水产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童第周教授转到重庆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生物系和复旦大学生物系,青年教师曾呈奎去往岭南大学植物学系工作;化学系教授兼理学院院长汤腾汉去往华西协合大学担任教授,后兼任该校药学系主任;物理系的郭贻诚教授去往燕京大学执教,王恒守教授先后去往南开大学和广西大学执教;体育系主任宋君复去往四川大学执教;中文系的系主任施畴去往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国文系主任,叶石荪教授去往四川大学执教,游国恩、萧涤非等学者则远走昆明在西南联大谋得教职;外文系李茂祥教授转去中央大学执教。

山东大学学生则随着学校迁徙而相继转入其他学校续读学业。从青岛计划内迁时正值暑假,不少学生尚未返校,学校便根据实际情况就近安排学生,如张汝刚、程立中、李春和等同学因学校暂不开课,前往在西安组建的西北临时大学借读^⑨。在万县安顿之后,蔡天心等同学去往四川大学借读,张

① 《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办法》(1938年4月14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767-007。

② 《山东大学百年史》编委会编:《山东大学百年史:1901—2001》,第109页。胡孝忠、秦丽媛认为先后有四批物资运出并有着详细考述,见其文《困顿与涅槃:抗战时期国立山东大学的内迁与复校》,《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③ 《关于制定渝万国立各馆校暂行保管山东大学各项学科设备给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的训令》(1938年4月14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档号:0126-0002-009600000-018000;《关于派宋锐庭提运山东大学测量仪器给教育部、浙江大学公函》(1938年5月7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档号:0126-0002-009600000-011000;《为国立山东大学和中央大学交接仪器的指令》(1938年10月1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773-001。

④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号:五-5343,第4页。

⑤ 《国立山东大学图书由中央图接管》,《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第1期。

⑥ 《关于收到国立山东大学仪器之收据》(1938年4月21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774-003。

⑦ 《关于将国立山东大学现存电机、抽水机及化学药品拨给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使用的呈、指令(附收条、证明书)》(1938年6月1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档号:0126-0002-009600000-018000。

⑧ 《教育部交由国立师范学院借用本校书籍器材清册》(时间不详),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775-001。

⑨ 《本校迁至安庆时为了解决学生免费乘车与各铁路函件并附公告》(1937年10月11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729-003。

致一等同学去往武汉大学学习。待到“暂行停办”，山东大学根据教育部指令，将529名山大学生之在学证书及历年成绩单登记造册，希望中央大学“查照准予入学”^①。

流散到各高校的山大师生，传播知识，赓续文脉，为国家未来的独立与富强积蓄力量。山东大学数学系青年教师王熙强离校后辗转至重庆编译馆任职，随后赴同济大学任教，其间偶遇母校生物系童第周教授及同窗张致一。此后他调至复旦大学，重逢原在山东大学供职的洪深、李达等教授及数学系校友薛洲善，不久又与童第周、张致一在复旦共事^②。王熙强的这段流徙经历，恰是日本侵华战争给山东大学带来巨大破坏的明证，也是此时山东大学薪尽火传精神的生动诠释。“散作满河星”的这批山大师生，能有机会再次相逢于青岛母校，已是在学校“暂行停办”八年之后了。

四、余论：“国土重光”与山东大学的战后恢复

自1928年“济南惨案”爆发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山东大学书写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17年的山大记忆。在融入抗日战争与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中，山东大学用自己四省流徙、三地办学的经历不仅见证了抗战之路的坎坷不平 and 艰苦卓绝，还通过思想引领与科学研究向世人展现了山东大学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和使命在心的担当精神。这是山东大学践行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写照，也是山东大学砥砺奋进的不竭动力。历经抗战烽火的淬砺和洗礼，散处全国各地的山大师生不仅抱持报国之志，也时刻怀揣复校之心。1945年8月，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之后，汤腾汉、宋君复、曾省、丁山等教授团结流散全国各地的山大校友，自发组织国立山东大学校友会复校促进委员会，并敦请杨振声、赵太侔等原任校长以及部分党政名流联名发声，共同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请求在青岛迅速复校。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于1946年1月决定恢复原国立山东大学建制。自1938年“暂行停办”八年之后，山东大学终在1946年春于青岛胜利复校，学脉得以延续^③。

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的校址，仍是其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的办学原址。其校本部鱼山路校区东接中山公园，西临海滨公园，风光旖旎，景色宜人，诚如蔡元培先生所言：“山大的环境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④实际上，从源流上说，这所校园本是1907年落成的德军俾斯麦兵营，1914年被日军强占并改称为万年兵营，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后被北洋军阀陆军征用，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时改为大学校舍。显然，它不仅有着幽静清雅的自然风光，还承载着慷慨悲歌的民族情感，正如高恩洪于1924年在私立青岛大学开校讲话中所言：“既可承继礼仪之邦荣誉之历史，又可为国土重光之纪念。”^⑤高恩洪发出这番言辞的22年后，这座校园又迎来了“国土重光”之纪念时刻。1946年10月25日，山东大学500余名师生代表齐聚学校大礼堂，举行抗战胜利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复校后的山东大学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砥砺前行、与时偕行，在凝塑其第二次发展黄金时期的历史进程中，于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迎来了新生。

① 《函告国立中央大学请准予本校学生入贵校肄业》（1938年3月25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档号：J110-01-0764-007。

② 王熙强：《天南地北忆师友》，载张乐岭等编：《峥嵘岁月》，第222页。

③ 复校过程可参见周钟岐：《向美军交涉收回校舍的经过》，载山东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山东大学校史资料》1983年第5期。

④ 蔡元培：《山东大学成立四周年纪念会演说词》（1934年9月20日），载蔡元培著、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46页。

⑤ 时桂山：《青岛大学开校，高校长之调词》，《顺天时报》1924年9月26日，第7版。

Pioneers, Struggles and Inheritance in Flames of War: The Respons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ui Huajie

(School of Histor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s a historical moment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cannot forget, and it is also a painful chap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By taking the wartime respons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indomitable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educational struggle amidst the flames of war. As one of the pioneering universities in modern China, Shandong University unfortunately suffered from the ravages of war as early as the "Jinan Massacre" in 1928 and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war ever since. In 1928, due to Japan's strong occupation of Jinan, although the 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started early, it faced an objective environment that could not be implemented, and the university was eventually forced to relocate to Qingdao to continue its operation. After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the school promoted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and carried out wartime education to highlight the social function of universities in serving the country. Many professors pursued academic service to the country with a scientific spirit, some students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progressive societies, and many students enlisted in the army to fight against Japan. In 1937, the "July 7th Incident" broke out, and Shandong University was forced to relocate inland. After arriving in Wanxian, Sichuan in the spring of 1938, it was temporarily suspended, solidifying the precious spirit of relocation.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who were scattered to various universities spread knowledge, inherit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accumulated strength for the future independen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From the outbreak of the "Jinan Massacre" in 1928 to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1945, Shandong University wrote its 17-year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magnificent journey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not only witnessed the bumpy and arduous road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ith its history of relocating to four provinces and running schools in three places but also demonstrated the university's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the world through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is not only a vivid practic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in embodying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ut also an inexhaustible driving force for Shandong University to forge ahead.

Keywords: Shandong University;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whole-nation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University inland migration

[责任编辑:陆 影]